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主持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大众传媒 与现代文学

陈平原 山口守 编

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既是技术，更是心态。
。

既是技术，更是心态。
。

面向 二十世纪文化研究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

陈平原 山口守 编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日)山口守编.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05-955-3

I . 大… II . ①陈… ②山… III . 大众传播 - 影响 - 现代文学 - 文集
IV . ①G206.3 - 53 ②I10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300 号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

编 者:陈平原 山口守

责任编辑:王方红

封面设计:雨 婷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红旗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92 千字

印 张:18.2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955-3/I·169

定 价:33.00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陈平原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中国各报存佚表》），这 1901 年发表在《清议报》第 100 册上的名言，已被历史证明是晚清最具预见性的论断之一。不过，这里所谈论的“文体”，必须扩大范围，涵盖及于整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狭义的文章（散文），现代中国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无不受到“报章兴”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刻影响。这点，恐怕论者当初并未完全意料到。

岂止是那则报刊文章的作者，很长时间里，文学史家（包括其他“通史”、“专史”的作者）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戈公振“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撰写《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时，着力于描述“文学革命进程”的史家，对于报刊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依旧一脸茫然。1922 年，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过于迷恋自家的“文白”与“死活”说，而忽略了近在眼前的《申报》等，实在可惜。紧随其后的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中论述“文学革命”兴起的诸多原因，比如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等，可就是忘了报刊出现的意义。

在“史界革命”的口号声中高歌猛进的梁启超们，同样没有认真对待眼前这些新鲜活泼但浅俗粗陋的报章。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四章“说史料”，提及“文字记录以外”的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以及“文字记录的史料”，如旧史、档案函牍、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金石、外国人著述、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等，可就是缺了自家最擅长的报章。考虑到任公先生谈论的史事包括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完全有理由要求其将报纸杂志引入，作为重要的史料。

好在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中，便曾仔细讨论史学研究引入报章的可能性：

又近世有一种新史料，为古人所未能梦见，厥为报纸（中国在唐代已有朝报，然其性质不能与近日报纸比）。此种史料之重要，西方史家已深切感知，惟今日中国史家尚鲜注意之。

张文接下来讨论报纸作为史料的三大优点，以及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病。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学者中最早意识到报章的史料价值、且对其引入史学所可能产生的利弊有过深入分析的宏文。

至于文学史写作之倚重报刊，很大程度得益于阿英的积极尝试。为近在眼前或刚刚逝去的文学运动“立此存照”，不能不更多地利用同样稍纵即逝的报纸杂志。从1934年希望真实呈现“新文学运动史”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到1936年将注重点转移到文学社团及相关刊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再到1958年真正以报刊为中心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

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阿英始终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努力将这一兴趣落实到文学史著述中。最典型的，莫过于 1937 年初版、而后不断修订的《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在该书第一章，阿英讨论晚清小说的繁荣时，专门提及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以及“不仅新闻纸竟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

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或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十五年前，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钩稽许多报刊史资料，借以讨论“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得到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这一思路，除承继阿英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外，还得益于其时刚介绍到中国来的叙事学、小说修辞学以及文学社会学著述。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这里有德国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公共空间”理论和法国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场”学说的启示，也有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的努力。但即便再精彩的理论，也都无法穷尽纷纭复杂、众声喧哗的文学世界。以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为“对话者”，在一系列审美的和历史的交谈中，实现人类的精神超越与文化更新，应该是文学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既是一门精湛专深的技艺，也是一种元气淋漓的行动——对话过程很可能比具体结论更重要。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院合作召开研讨会，正是这一“对话过程”的延续。选择“大众

传媒与现代文学”为中心话题，乃预感到这一课题所具有的学术潜力，值得中日两国学者认真开掘。不只在会场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还将修改后的论文结集成册，公开刊行，表明我们对此话题持续不断的兴趣。至于邀请北大博士生李宪瑜、颜浩、魏泉、杨早、葛飞等五君（前两位已经毕业）加盟，则是体现“论坛”本身的开放性。

如此说来，有关“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第二、第三次集会，或第二、第三册论著，并非没有可能“接踵而至”。

2002年8月26日于西三旗

序二：东亚的现代化与文学和传媒 ——战争生成的国家与国民

山口守

本书所收录的日本大学方面的论文，是对 2001 年 11 月 20 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加以整理的直接成果，同时也是从 2000 年起持续至今的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关于东亚近代化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参加者：山口守、红野谦介、金子明雄、近藤直子、土屋好古）成果之一部分。先于这个共同研究，我们曾于 1999 年 11 月 22、23 日邀请北京大学的费振刚、陈平原、张鸣、李零、关海庭诸氏，在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举行了“日中历史文化论坛”——当时在超越了传统和现代单纯的二分法、围绕着日中两国的历史和语言的讨论中，“何谓现代”这一基本性的、根源性的问题就已经作为共通的出发点浮出水面，成为其后推进共同研究的基础。“何谓现代”这个本质主义的问题，在冷战体制崩溃前后，围绕着重建世界秩序各国的政治流动化之中，曾一次次地、在社会种种不同的场合被一再论及。然而我们却并非仅仅将它放在国际政治或世界形势中进行思考，而是把它当作在自己视为研究对象并持之以恒地保持兴趣的领域里，考察具体对象时的一个术语来加以认识的。在展开这样一种尝试性的考察之际，我们既批判以重新评价历史

的形式来掩饰对某些既往历史讲述方式的逆反、企图重新建构国家民族至上主义的言论，同时对自己是一面置身于尚未完成的现代的正中、一面将现代自身作为考察对象一事进行反躬自问，以及从某种现代模式的终焉中可资学习的东西是什么，这样一种批判的借鉴都是重要的。我们的共通研究便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将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东亚现代的战争与殖民地问题置于中心，主要是在文学和历史领域展开研究。

从 2000 年开始，我们的共同研究以“关于东亚近代化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为主课题，以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俄国史等各自的主要专攻为立足点，一面追踪战争和殖民地的历史，一面就日本、韩国、俄国、中国及中国台湾的现代，以文学和传媒问题为中心，拓展研究的范围。具体地说来，2000 年度除了共同研究参加者外，还请来了美国和韩国的研究者，从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及社会；并在就波兰的日本文学研究进行学习时获得了外在地验证日本文学的机会；对中国台湾与朝鲜等受到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地域的文学、文化、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而 2001 年度更注目于日本在接受西方式现代的过程中作为后发帝国主义国家推进侵略亚洲各国的步伐，将中国台湾、朝鲜纳入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是将何种文化压制强加给当地人民，同时这在日本国内作为现代里面的病又是如何潜藏于地底的；一面适度地限定时代范围，注目于战争对传媒的发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将自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和俄国的传媒研究与近代文学史结合起来，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这里收录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2001 年度的共同研究进展，既是各位共同研究参加者对固有研究领域的个案研究，同时，前述问题意识及角度也是和其他共同研究参加者在一定程度上共有的。下面就所收论文具体地加以检视。

红野谦介的《明治三十年代的杂志〈太阳〉上新闻照片的变迁——如何导演“真实”》和金子明雄的《战争报道形成传媒——以博文馆〈日清战争实记〉为立足点》两篇论文，皆以明治期的杂志《太阳》或《日清战争实记》为线索，就自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传媒通过战争报道如何对国民的生成发挥机能加以考察。红野论文主要分析、批评了照片这一视线语法是如何与传媒技术的发达互动、在走向战争及灾害中群众及英雄表象化的过程中进入言说世界，以及言说又是如何约束固定视线这一错综交叉的状况。而金子论文则使用统计资料，确认了日本的杂志、报纸媒介的发达是从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起飞，至日俄战争而正式形成气候的，并通过《日清战争实记》的个案研究作为考察战争这一国家总动员体制同时也是传媒的战争、表象的战争的铺垫，试图解明当时的战争报道所产生出的视线的空间及时间远近透视法。土屋好古的《日俄战争与俄国社会》从俄国近代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将焦点对准日俄战争另一方当事者俄国资本国内战争报道及围绕着有关战争态度的言说，就日俄战争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战败如何成为导致第一次革命的契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山口守的《中国形象的虚拟——他者理解的困难》则将考察对象的时间幅度略加扩展，在绘画作品中寻求现代以前的欧美人及日本人投向中国的目光的具体例证，从对这种单方面的异国认识出发，叙述了中国人形象是如何被战争及社会状况所界定，并且又反过来界定人们认识的，是一篇揭示了今后研究方针的绪论式的文章。最后一篇垂水千惠的《吕赫若文学中〈风头水尾〉的位置》系2000年度共同研究的招聘研究之作。该论文提及《决战台湾小说集》作为二十世纪中叶日中战争末期在殖民地中国台湾面向战争的总动员体制波及文学的例证，分析道：吕赫若的《风头水尾》为国家性想像力所束缚这一状况自身凸现

出殖民地作家的苦斗与内心纠葛，透露了战争期间日本文学的畸形性。

这五篇论文，尽管时代与对象多少有所不同，但都着眼于战争与文学及传媒的关系或彼此互动的机制展开研究，通过国民生成过程来重新思考现代自身的意味，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通的关心和视角。进而言之，如将这些日本大学方面的论文与北京大学方面的论文结合起来阅读，则双方的研究者在超越了日中两国社会的、文化的语境差异之后，就探索现代的外延和内涵这一共通的课题是如何交错如何交流的，恐怕就显而易见了吧。

最后，向为本书的出版惠予协作、尽力的诸位先生表示感谢。首先向为 2001 年 11 月 20 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鼎力相助，提供宣读论文和讨论的珍贵场所的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及其负责人陈平原教授表示感谢，那次研讨会成为本书所收论文的基础。同时，陈教授所属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对研讨会的召开也不遗余力地予以积极支持。张鸣、张剑福两位教授自 1999 年在日大举行的研讨会以来，无私无我地承担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间的联络、调整工作，为 2001 年 11 月 20 日在北京大学成功地召开学术研讨会竭尽心力。此外还要向为日大、北大两次学术研讨会担任口译，以及为本书所收论文承担翻译工作的施小炜先生深表谢意。

本书收录的论文仅仅不过是现阶段我们共同研究参加者的一个通过点而已，毋庸赘言，今后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来自读者的严厉批判，必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敬乞叱正是盼。

目 录

- 序一 陈平原(1)
序二：东亚的现代化与文学和传媒
——战争生成的国家与国民 山口守(5)

第一辑

- 明治三十年代的杂志《太阳》中新闻照片的变迁
——如何导演“真实” 红野谦介(3)
战争报道形成传媒
——以博文馆《日清战争实记》为立足点 ... 金子明雄(30)
日俄战争与俄国社会 土屋好古(52)

第二辑

- 中国形象的虚拟
——他者理解的困难 山口守(83)

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 ——《女子世界》研究	夏晓虹(109)
旧文人：现代文学中的另类存在 ——《青鹤》研究	魏 泉(158)

第三辑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新青年》研究	陈平原(185)
“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 《新青年》杂志“通信”栏	李宪瑜(266)
一班刊物竟成三 ——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	杨 早(282)
《语丝》时期的苦雨斋弟子	颜 浩(311)

第四辑

《现代》诗歌的历史定位与艺术探索	孙玉石(345)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 ——以《无轨列车》、《新文艺》与《现代》为中心	葛 飞(402)
《长河》中的传媒符码	吴晓东(420)
吕赫若文学中《风头水尾》的位置	垂水千惠(436)

第五辑

全球化：认同或追问	张颐武(455)
“NEW BEIJING 小剧场” ——当代小剧场与公共领域	韩毓海(475)

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	贺桂梅(488)
重写红色经典	戴锦华(506)
附录 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陈平原(561)

第一輯

明治三十年代的杂志 《太阳》中新闻照片的变迁 ——如何导演“真实”

红野谦介

前　　言

1895（明治二十八）年4月17日，日本和清国（当时日本对清朝的称呼。中译者注）签订了日清媾和条约。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中译者注）结束的这一时刻，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被否定、朝鲜独立得到确认，同时还作出了割让辽东半岛以及台湾、澎湖列岛、支付赔偿金等政治决定。由此，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首次扩张了领土、拥有了殖民地。

事实上，由于俄罗斯、德国、法国三国的干涉（4月23日），在5月4日的阁僚会议上日本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然而台湾、澎湖列岛则在此时并入日本领土。但是5月25日台湾便立即发生叛乱事件，日本直接面临着殖民地统治的困难。如何定义日本在何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学的课